

浅析 1883 年金融危机中的中国商人

——以徐润和胡雪岩为例

姜 新, 周宝银

(徐州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摘 要: 1883 年的上海金融危机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的危机之一, 刚刚向近代化起步的中国经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在这场危机中, 尽管徐润、胡雪岩同样破产, 但是他们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徐润是“限于时”, 是时代的大背景使然, 是任何个人都无法避免的; 而胡雪岩的破产则是“囿于势”, 具有被时代淘汰的意味。

关键词: 金融风潮; 胡雪岩; 徐润; 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 K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808(2009)05—0088—05

1883 年(光绪九年)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近代中国发生了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 众多商人在危机中受到沉重打击, 对此学术界极为关注, 众说纷纭。然而, 学术界对危机过后, 有的商人一蹶不振, 有的商人却东山再起, 不同的命运及其背后深刻原因却鲜有讨论。其实, 不同命运折射着不同经营道路、经营理念, 分析不同命运及其原因对于全面认识这次金融风潮、近代的民族资本乃至近代中国经济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尝试以胡雪岩和徐润作为典型, 对“不同命运”发表一管之见, 求教方家。

一、历史之谜: 相同遭遇, 不同命运

晚清的金融危机是迄今两百年间对中国社会具有较大影响的金融危机之一。危机首先在上海爆发, 1883 年初一个叫“金嘉记”的丝栈突然倒闭, 亏损白银 56 万两, 累及钱庄 40 家, 由此拉开了一场波及全国各个重要商业城市的金融大风潮的序幕, 昔日繁华的上海滩一时百业凋敝, 一片恐慌, 市场急剧萎缩, 股票价格暴跌, 钱庄大量倒闭, 商人受到最直接、最沉重的打击。特别是在处于危机中心的上海地区, “举市所存现银不到百万, 恐慌不堪言状, 巨家如胡雪岩、刘云记、金蕴青皆相继坏事, 其

余商店接踵倒闭, 不知凡几, 诚属非常之祸”^{[1] 35}。“斯时兼有胡姓的大户, 以受挤, 周转不灵, 而润遂继之。”^{[1] 82-83}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商人胡雪岩和徐润相继遭受最为残酷的损失。

(一) 经济上一败涂地, 难分彼此

1883 年 12 月 1 日, 上海阜康钱庄闭歇, 12 月 3 日京师阜康分号关闭。接着, 镇江、宁波、杭州、福州、南京、汉口、长沙等分号也相继搁浅。随后朝廷发布上谕, 称: “现有阜康商号闭歇, 亏欠公私项及各处存款为数甚巨, 该号商江西候补道胡光墉著先革职, 即令左宗棠饬提该员严行追究, 勒令将亏欠各处公私的款赶紧逐一清理, 倘敢延不完缴, 即行从重治罪。并闻胡光墉有典当二十余处分设各省, 买丝若干包, 存置浙省。著该督咨行各省督抚, 查明办理, 将此谕令知之。”^{[2] 434-435}这次阜康倒欠的公私款项约 1200 万两, 其中以官款为重。比如, 阜康及其分号裕成倒闭时, 福建“省司道府库及税、厘、善后局汇兑京、协各饷, 或购军火, 或地方善举, 有该商经手共计存银二十三万一千两”^{[3] 570}, 有浙江著追的 1613900 余两, 另有亏欠江海关、江汉关及两江采办军火、电线的银 786800 余两, 两项共

[收稿日期] 2009-09-05

[作者简介] 姜 新(1952—), 男, 北京人, 徐州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教授, 研究方向: 中国近现代史;

周宝银(1982—), 男, 江苏宿迁人, 徐州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硕士, 研究方向: 中国近现代史。

2400700余两,占欠官私各款的 20%。胡雪岩被革职清理后,至 1885 年 12 月 17 日,除缴还者外,尚欠 20800 余两。胡雪岩名下的当铺、药店的财产等也被拿来抵消债务。(另一说法此时还欠清政府银六万两^[4])。在危机后,胡雪岩由于政府逼债,在经济上一败涂地,处于破产状态。

危机爆发时,徐润因为房地产业务的过分扩张,积压大量资金,而此时房地产虚假繁荣的假象被金融风潮吹破,加之他所拥有的股票(成本为 120 万余两)价格大跌。钱庄逼债,徐润在万般无奈之下,不得不将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房地产忍痛低价抛售,先后卖出房产 32 处,卖出地产 2900 余亩。此外徐润还被迫卖出所持的股票及典当业。为清理这 200 余万两的债务,徐润不得不将价值 300 万余两的资产抛卖,为此徐润亏蚀八九十万两,可谓一败涂地。此时的官债又逼,1884 年徐润因挪用招商局十六万千余两白银而遭清政府革职,“唯徐润原欠银十六万千余两,前交银七千余两,又似房地产契抵银十四万数千余两,核计尚未足数”^[5]²²⁵于是盛宣怀“查有亏欠局款情事”,并与邵有濂(江海关道)“确查账目,督同清理”^[5]²²⁵。经济上面临“法越事起……阜康既倒,银根更紧,周转不灵,一败涂地”;“家业荡然,生机尽唉”^[6]¹⁶¹。

(二)政治上同受磨难,结局不同

胡雪岩和徐润不仅在经济上损失相似,在政治上也有惊人的相同之处。晚清政府对自己的债权保有“优先受偿权”,他们忙着追逼官款,就连帮助其镇压农民起义、立下赫赫功劳而被赏赐二品衔的红顶商人也不放过。“现有阜康商号闭歇,亏欠公项及各处存款为数甚巨,该号商江西候补道胡光墉著先革职。”^[2]⁴³⁴⁻⁴³⁵再看徐润的情形,据史料载“徐润原欠银十六万千余两,前交银七千余两,又似房地产契抵银十四万数千余两,核计尚未足数”,于是“应请旨二品衔浙江补用道徐润革职”^[6]¹⁶¹,清廷将徐润革职并将其驱逐出招商局。在官府看来倒欠官款尤为可恶,应该受到严厉惩罚。不论是徐润还是胡雪岩在政治上都丧失了清王朝二品大员的官势。

值得深思的是,在危机后的年代中,他们的命运却又发生了不同的变化。胡雪岩在危机后不久“光墉未几即死”(1885 年底,时 62 岁),“是时贾商贩卖挟胡氏物出售者……至于清亡而未已。”^[7]⁸⁸但是徐润危机后,觉得商机不可误,“变卖亡母、亡妻的有关衣服佩带、古董玩器、字迹书画、金银首饰,

得银 8 万两”^[9]¹⁴¹转向天津,并取得了很好的进展。1890 年,徐润受李鸿章札委“办广东香山天花银矿,1891 年,复回开平煤矿,1892 年,“总办热河金矿等处”^[1]¹³⁷。1897 年,李鸿章对徐润在主持招商局间的成就表示“颇蒙嘉许”。政治上,1890 年,李鸿章奏请给徐润尚戴“三眼花翎”并恢复了候补道台的职位^[8]⁶⁶。是何原因造成他们的遭遇相同,而在危机后的命运却截然不同呢。徐润在危机后东山再起,重新活跃于政治经济舞台,而胡雪岩则遭此沉重打击而一蹶不振。究竟原因若何?本文将进行初步探讨。

二、对危机后不同命运的原因分析

(一)在危机中面对债务:消极对待与主动面对

胡雪岩(1823—1885 年),本名光墉,字雪岩,原籍安徽绩溪,靠经营钱庄、银号起家,通过捐纳取得道员资格。后攀附左宗棠,因左保奏而被授红顶戴,赏黄马褂,成为清朝的二品大员。胡利用官势开设钱庄、当铺,到 1883 年已成为著名的金融家,时人为之“胡财神”。胡雪岩鼎盛时期有良田万亩,在上海杭州都有豪宅,在各地开设 29 个当铺,并有泰来、通泉钱庄,阜康、通裕、裕成、乾裕银号和阜康票号,分支机构遍及全国各大商业城市。大约从 1881 年五六月间,新丝上市之后,胡雪岩便开始大量收进生丝。到 1883 年 5 月,胡雪岩所囤积生丝已达 14000 包,为此他已垫出资金 2000 万两白银,而当年浙江气候不佳,生丝减产。胡邀同行齐约坚持高价售卖,而当年意大利丝丰收,信息灵通的上海洋商转向意大利购运,由此,上海丝价大跌,胡雪岩不得已将生丝低价出售给洋商,亏蚀一二百万两白银。上海阜康存户闻讯争来提款,一时无以应对,于 1883 年 12 月 1 日闭歇。12 月 3 日,京师阜康分号关门,接着镇江、宁波、杭州、福州、南京、汉口、长沙等分号相继闭歇,市场大为恐慌。危机爆发时,胡雪岩“即赴金陵见左公,备陈始末”,面对债权“光墉将其产业簿据献与文荃,不稍隐匿。……文荃设局清理,令候补州县二十九人接收各典。”^[7]⁸⁷知道大局将不可收拾后,胡由上海回杭州“遣散姬妾,各予银二千两”^[9]¹⁹⁴。面对债务,胡雪岩采取封建式的消极回避,先找左宗棠无果,后遣散姬妾,坐以待毙。将财产交由债权人处理,在债务偿还中处于被动状态,使自己失去了主动性。因此,资本丧失了流动性,失去了资金再筹集的能力。其结果不但未能还清债务,而且丧失了偿还债务的能力。

徐润,名以璋,字润,号雨之,别号愚斋。生于广东香山。15岁随伯父徐玉婷在上海宝顺洋行学徒,22岁就任洋行买办,不久升为总买办。直到1868年宝顺洋行歇业,徐润开始投资洋务派创办的近代企业并经营房地产、丝茶、烟土等自营企业。到1883年危机爆发时,徐润已成为上海有名的“地产大王”,拥有未建之地2900余亩,已建之地320亩,共建洋房51所、住宅222间、当房3所、楼房街房1890余间,每年可收租金12.29万余两。总计,徐润地产业当时总投资223.69万余两银子,成为上海名符其实的“地产大王”。为实现自己的抱负,徐润多方奔走,想办法利用自己在上海金融界的诚信,从钱庄、股票抵款、洋行房产找头抵款及各存户款筹到资金252万余两,用以开办其地产公司。正当徐润要实现自己生平抱负之时,金融危机席卷上海,面对如此艰难之时局徐润承担全部经济风险,主动面对危机。1883年11月21日,徐润召集所有债权人告知,他因为资金周转困难,现已处于破产状态。经过与债权人磋商,徐润公布所有产业账目和股票清单,同时宣布他的全部房地产(成本220万两)和所有股票(经债权人会议认定现值982530两)交予债权人全权处理,用以抵欠252万两白银的债务。面对债务徐润主动兑现,积极面对市场,体现出一种强烈的近代经营意识。

让人深思的是,徐润和胡雪岩都是当时名噪一时的红顶商人,都是依靠官势来支持自己的生意,又都曾在官商领域中游刃有余,他们同时在危机中跌倒面临债务的困扰,而他们的处理方式为何大相径庭呢?这与他们财富积累的方式与事业的经营策略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危机前财富积累的道路不同

胡雪岩是杭州一家钱庄学徒出生,因资助困境中的王有龄而结为生死之交。后来王有龄官场发达,胡雪岩利用王有龄的官势开始经商。1861年王有龄自缢身亡后,左宗棠出任浙江巡抚,胡雪岩因办差得力而深得左宗棠的信任,左多次在其奏折中给予正面评价,请求朝廷“破格优奖”,“赏加布政使衔”^{[3] 13},之后又请朝廷赏穿黄马褂。与此同时,胡雪岩的生意也稳步展开。胡雪岩的钱庄票号吸纳到了官方的存款、汇兑业务,阜康票号还一度经理着浙江、福建、上海等地的海关官银号,这样的商业机会,为其建立商业“帝国”奠定了雄厚的财富基础。为此,胡雪岩可以利用钱庄和官方存款、官僚背景来支撑自己的生意和大笔

投机,19世纪60年代投机大米,80年代初又专注于生丝投机。70年代后,胡雪岩开始经手政府外债,前后六次,涉及本金达1595万两。在代政府借外债过程中,胡雪岩赚取了巨额利润,大概在“300~350万两白银之间”^{[1] 211-213}。可以说胡雪岩的财富帝国的资金来源无一不与政府有着密切关联。

徐润的家乡香山离澳门较近,得风气之先,徐润出生于买办世家,其伯父徐玉婷、叔父徐荣村是宝顺洋行著名的买办,徐润在1852年入宝顺洋行,1868年离开,共十六年。在此期间,宝顺洋行在徐润担任总买办期间业务迅速发展“实一时之盛”“在洋行中可屈指一指也”。徐润在买办期间同时开展自己的商务活动,其经营商品包括丝、茶、麻、棉、烟土、桐油等,从上海到浙赣山区,从长江沿岸到沿海各埠,均有徐润的商业足迹。徐润的买办生涯和从商经历是他人生打基础的时期。他学习了商业知识、融会了商业技巧、增长了能力、磨炼了意志,产生了两个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是使他学会了企业管理知识和经验,这对后来经营洋务企业和自办近代企业打下了知识基础;二是积累了发展民族工商业的资金,在买办和早期的商业活动中他的总收入为137.9218万两,为他后来投资洋务派创办的近代工矿业和他自己创办近代民族企业提供了资金来源。可以说徐润的成功来自于搏击市场,运用现代的经营理念与经营方法,按照经济运作的规则赚取市场利润。

(三)致富后资金的投资方向不同

胡雪岩除了将一部分资金用于商业投机外,还大量购置土地,据称其有“田地万亩”,而且采取封建的经营方式,收取地租,牟取封建利润。在个人生活方面,胡雪岩则属于极端的享乐主义者,“在上海、杭州各营大宅,其杭宅尤为富丽,皆规制御仿西法,屡毁屡造,中蓄姬妾辈十余人”,^[9]“偶一出游,出马塞途,仆从云拥,观者啧啧叹慕,谓为神仙中人”^{[9] 195}。购置土地和奢侈消费无疑占用了大量资金,从而影响到其商业的再投资。胡雪岩本人对近代企业表现出一种本能的抵触,他以“畏洋商嫉妒”为借口^{[8] 146},拒绝李鸿章和朱其昂邀请其投资轮船招商局;以政府抵制为借口拒绝怡和洋行邀请其合办“机器棉纺织公司”^{[11] 271}。可见胡雪岩的所作所为,始终使自己在封建传统的商人的范围之内,使资金流动性不足,无法进入市场交换。而当时世界正处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快速发展时期,胡雪岩是

逆时而动，其最终失败的结果是必然的。

徐润除了经营房地产和茶叶等商业外，还投资工矿业。改组轮船招商局时他个人入股 48 万两，开平矿入股 15 万两，投资贵池煤矿 10 万两，投资三山银矿 6 万两，投资平泉铜矿 6 万两，投资金州煤矿 5 万两，投资宜昌鹤峰州煤矿 1 万两。此外，徐润创办民营企业也投入大量资金，独立承办景纶袜衫厂时就投入 17 万两；当时他投资的民营企业还有同文书局，广百宋斋印书局，上海虹口伦章造纸厂，粤东自来水公司，香港利远糖榨公司，烟台巢丝局，华兴、华安保险公司，玻璃公司，电车公司，牛奶公司等。在当时中国社会习惯于手工技术而大多拒用机器设备的情况下，徐润率先在自己经营的企业中注重先进的经营方式和购买先进的机器设备，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投资这些近代企业，按照市场规律运行，按照近代商业法则，扩大生产，积累资金，这是当时许多中国人所不可企及的。

（四）对事业的经营方法不同

胡雪岩的商业是传统经营，按照传统的商业惯例，胡雪岩将许多分店交给经理经营，并且给予经理绝对的支配权。胡雪岩“所用号友，皆少年明干精于会计者。每得一人，必询其家食指若干需用几何，先以一岁度之，粵之，俾无内顾之忧。”这种经营的弱点不委任独立人审核账目，以致“久而用奢，不免侵渔，渐成尾大”。但由于传统的经济思维的支撑，胡雪岩始终未能找到一种有效的制止方法和解决方式。胡雪岩为了旷达钱庄的利润，他的钱庄到 19 世纪 80 年代，“其资本金不过存款的 5.9%，为贷款的 5.1%”，^[13]如此之低的资本金比率，自然难以抵御金融危机的冲击。

徐润在其创办的民营企业中，采用先进的工业技术、先进的机器设备，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1882 年，徐润与徐秋哇、徐宏甫集股在上海创办同文书局时，向外国购买机器，雇佣工人有五百名，采用先进的影印工艺，独办景纶袜衫厂后，他更加注重采用先进的技术和购买先进的机器设备。由于经营得法，创出了品牌，销路大开，与南洋各地签订了货单，且供不应求。徐润先后投资的上海造纸厂，粤东自来水公司，香港榨糖厂，烟台螺丝业，华兴、华安保险业，玻璃厂，电车，牛奶业都运用了先进的技术设备，提高了生产率和近代化水平。他从 1873 年承办洋务派企业轮船招商局起，制定《章程》和《局

规》，将西方股份制经济模式引进中国，1875 年创立保险招商局，1876 年创办仁和水险公司，1878 年创立济和水险公司，这些都验证了这种模式的成功。

作为相同时代、地位相同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与徐润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区别，是由他们与官员的关系以及各自的经营理念所决定的。

三、重官与重商

（一）对官员的作用不同

在晚清的社会中，商人通过两种途径进入士绅阶层：一是捐输，二是捐纳。一些商人常借助于捐纳的头衔而获得半官方身份，成为官场的局内人，并继续经营着私有或半官方企业，胡雪岩和徐润便是其典型。他们最后都成为清朝的二品大员，但是他们不是正式的官员，只是一种名誉头衔，是用来达到他们的商业目的。但是他们对这种名誉头衔的利用情况不同。

胡雪岩是属于官员的幕僚，需要的不仅是经济才能，更重要的是政治才能，以面对太平天国、捻军和新疆问题。他的经济活动和日益复杂的政府财政问题搅混在了一起，19 世纪 60 年代，因太平天国问题而造成的道路阻塞、官军粮饷、军火缺乏，使之投机大米成为可能。70 年代，左宗棠西征，任命胡主持上海采运局局务，并主持办理政府外债事务，利用海关银号获得政府的岁入额。胡利用这些条件来支持他的大笔生意。这是他赖以发达的机遇，但这种机遇是不稳定的，容易使经济活动陷入政治漩涡，“上海道邵小村（友濂）观察本有应缴西饷，勒之不予”，^[14]^[16]使胡雪岩在经济危机中雪上加霜。因此，胡雪岩在经济危机中破产以及危机之后不能崛起，与其依靠官势、其经济事业陷入官僚政治有密切关系。

徐润是官员们所需要的一种商业顾问。19 世纪 70 年代，洋务派开始大量创办工矿企业，而他们自己并没有经营这些企业的力量，结果他们不得不招募那些“既有专门知识，又有企业精神”的买办来经营管理这些企业，并把他们的大量资金投入这些企业中。徐润早期的经营才能博得了李鸿章的赏识，他先后被委任为招商局会办（实主办）、开平矿物局会办等职。即使在危机后，徐润破产丧失了经济和政治地位时，因为其杰出的经营才能，李鸿章仍表示“颇蒙嘉许”，并且重新启用徐润经营近代工矿企业。徐润虽然也借助于官势，但徐润的事业还是以经济事业为主，很少卷入政治纠纷。

(二) 对市场的不同理念

在传统的商业领域内, 胡雪岩经营着种类繁多的各种生意, 但是其生意无不与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国家不稳定的形势下, 采取囤积居奇的传统经营方式可能会暂时取得一些成功, 但是随着对外经济交流的扩大、社会的稳定, 胡雪岩丧失了早期的许多财富来源(比如投机军火、大米, 办理外债, 汇兑军饷等), 因他缺乏近代企业经营的理念, 想要保住他的财富帝国, 只能一方面继续保持原有的经营项目, 但这又不足以满足胡雪岩的财富野心, 一方面进行更大规模的投机——生丝的囤积。而这时的世界市场已进入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状态, 胡雪岩想以一己之力垄断世界市场, 其结果是可知的。而当时的形势是“频年外洋丝市不振, 光墉虽多智”, “世界交通未若今便, 不通译者每昧外情, 且海陆运输, 利权久失, 彼能来我不能往”。^[9] 186 胡雪岩因为“昧于外情”在囤积生丝时自信心甚高, 反映了传统商人被隔离于市场的悲剧。

徐润在结束其买办生涯之后, 即走上实业道路。他的经营是建立在地市场需求之上的, 符合当时社会的需求, 虽然其在金融危机中也曾因为房地产的过度扩张而破产, 但是, 后期徐润的房地产经营中心由上海转向北方的天津, 采取了先稳后进的策略, 并迅速崛起。徐润不论在投资方式和经营方法上都充分考虑市场因素, 反映了近代企业家在市场的努力进取。

四、结语

19 世纪末, 中国已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 一些近代行业在中国逐渐兴起, 徐润、唐庭枢、郑观应等已开始投资新式企业, 采用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时, 提出了与洋人“商战”的口号, 开始了由传统

商人向近代商人的转变, 而胡雪岩依然经营着传统商业, 固守着古老的经营理念 and 经营方式。在 1883 年金融危机中, 尽管徐润、胡雪岩同样破产, 但是他们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徐润是“限于时”, 是时代的大背景, 任何个人所避免不了的。而胡雪岩的破产是“囿于势”, 具有被时代淘汰的意味。时代变了, 经营观念、经营方式必须变, 作为企业家依靠官势发迹终究难以取得最后的成功。成功的企业家必须紧扣时代的脉搏、遵循市场规律才能站稳脚跟, 进而获得大的成功。

[参考文献]

- [1] 徐润. 徐愚斋自叙年谱[M]. 台北: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8.
- [2] 清实录. 德宗景皇帝实录(三)[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3] 左宗棠. 左宗棠全集. 奏稿八[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6.
- [4] 刘广京. 一八八三上海金融风潮[J]. 复旦学报, 1983(5): 245—266.
- [5] 夏东元. 盛宣怀年谱长编. 革徐润、张鸿祿职片[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4.
- [6] 张世红. 晚清买办与实业家徐润研究[D]. 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5.
- [7] 刘体智. 异辞录[M].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社, 1988.
- [8] 费维恺. 中国早期工业化[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 [9] 徐一士. 一士类稿[M].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66.
- [10] [美] 郝延平. 19 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M]. 李荣昌等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8.
- [11] 张国辉.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 [12] 孔祥毅. 1883 年金融危机中的票号与钱庄[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0, 22(3): 58—60.

Brief Analysis of Chinese Merchants in the Economic Crisis of 1883

——Taking Xu Run and Hu Xu—yan for Instance

JIANG Xin, ZHOU Bao—yi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Tourism, Xuzho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China)

Abstract: The economic crisis of 1883 in Shanghai w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crises in Chinese history. In the crisis, Chinese economy just on the way to modernization suffered unprecedented heavy losses. Though Xu Run and Hu Xue—yan both went bankrupt, yet they were different in nature. Xu Run's bankruptcy was restricted by the phase, the background of the society, which could not be avoided. However, Hu Xue—yan's failure was caused by the trend. In a sense, he was eliminated by the times.

Keywords: economic unrest; Hu Xu—yan; Xu Run; comparative research

(责任编辑 郭继荣)